

以新理念引导学科建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张连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是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重镇之一。在该学科建设过程中,赵德馨提出的“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对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赵德馨基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的理念,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付诸实践,提升了经济史学科的定位。回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学科建设经验:一是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为指导;二是形成和贯彻与学科特点相契合的学科建设理念;三是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又能较好实现新老交替的学术研究团队;四是注重学科成果体系的构建;五是重视学科自觉意识的养成。

关键词:经济史学;学科建设;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0)04-0148-09

学科建设日益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依托。回顾和研究学科建设史,总结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探寻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学科建设,也具有学术史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向来重视学科建设,拥有若干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学科点。其中,经济史学科经过60余年的建设,已成为国内中国经济史学重镇之一。在此过程中,著名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教授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拟以赵德馨建设经济史学科的理念与实践为中心,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历程,总结其学科建设经验,以期为推进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提供启示。

一、以新理念发展旧学科: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向前跨进一大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创建于1953年。该年,赵德馨被选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56年,赵德馨以优异成绩毕业,返回中南财经学院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①。赵德馨的学成返校,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带来了“跟随历史前进”的重要理念,对此后的学科建设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跟随历史前进”是赵德馨于1955年形成的一个理念。此后,这个理念一直伴随他的治学生涯。

收稿日期:2020-06-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15AZD051)

作者简介:张连辉(1978—),男,山东菏泽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赵德馨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时,中国历史学界普遍将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断于1919年。给赵德馨等人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戴逸先生亦遵循这一断限标准。1954年,胡绳发起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探讨1840~1919年期间的历史分期问题。这触发了赵德馨对中国近代史下限的思考,使其萌生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实后延时间下限的观点。1956年1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举行学术研讨会(即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科学讨论会历史学分会场),讨论戴逸先生的论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赵德馨在发言中着重说明,在1949年之前,将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和中国现代史的上限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成为历史,中国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期。随着历史时代的更迭,仍沿用此前的断代年份与术语的做法值得商榷。对历史时期的断代以及与之相应的称谓,应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变化。因而,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是184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上限是1842年),下限应是1949年。其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国现代史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上限是1949年,下限应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后延。其社会性质的内涵,1949年起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现在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完成后便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赵德馨首次公开表明“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当年,苏联权威历史学杂志《历史问题》较详细报道了这次讨论会,并多次提及赵德馨的发言。这次发言的摘要,后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上。随后,他又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4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赵德馨返回中南财经学院任教后,开始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他主持编写的教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则贯彻了他的上述主张,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下限从1919年扩展到1949年,使这门课程更加丰厚和充实,呈现出新的面貌,将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58年8月,高等教育部举办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展览会。在参展的16部中国经济史教材中,经高等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被评为最优,随即被高等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推荐教材(第一部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使用的经济史教材),并于同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该书于1969年在美国被节译为英文,于1971年在日本被全译为日文出版。其所以能被评为最优并被外译,一个共同原因是它写到了1949年,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完整的叙述与分析。赵德馨和经济史教研室的各位老师都发现,在本科生教学,特别是在函授生(干部)教学中,学生最感兴趣的也是1927~1949年时段的经济演变。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成为受学生欢迎,因而也受到学校重视的课程。国内同行专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肯定,国外的移译和学生的反应(教学的效果),给赵德馨践行“跟随历史前进”理念以鼓励。他从中得到一种认识:经济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内容跟随历史前进,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

循此跟随历史前进的思路,赵德馨又先后主编或撰写了两部教育部向全国推荐使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赵德馨主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该教材根据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形势和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全书主线中增加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演变”的内容,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章节和台港澳经济章节。当年,该教材即被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优秀出版物。1992年,该教材被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一等奖。2003年,赵德馨撰写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上册为中国近代经济史(1842—1949)。该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层次的经济现代化确立为主线。该教材是教育部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项目最终成果、“九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4年获河南省人民政府优秀图书一等奖。在近半个世纪中,由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位学者主编的三部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之所以能一直受到中央教育部门的青睐和推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始终能够站在新的认识高度积极回应时代的新要求。这得益于“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是此理念的充分体现。

二、以新理念构建新学科: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

新理念不仅推动了旧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新学科的建立。1956年,中国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赵德馨认为,这个事件标志着始于1927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已经成为历史,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后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时期。因此,可以将1949~1956年之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纳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范围内,应该开始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随后,赵德馨与周秀鸾、张郁兰、谭佩玉组成研究小组,花了近一年时间,研究了1949年10月~1956年12月的经济发展情形,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讲义(1949~1956年)》,并向学生讲授其内容。由于课程设置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合并为一门课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使用两本讲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讲义》。1962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要精简课程和讲义。从1963年起,该课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内容被精简。1965年之后,原来的研究小组不复存在。但赵德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与观察未曾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1979年,由于赵德馨具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追求、兴趣、能力和积累,中南财经学院洪德铭院长面请赵德馨主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当时开展此项研究并非易事,一些老师怕犯错误而顾虑重重,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又是一个全新而重大的研究领域,因而对于能否组织起一个具有相当科研力量的课题组,心中无底。但在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赵德馨决心承担此项任务。经过3年多的准备和动员,一个由20多位教师组成的跨系科、老中青结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于1983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在课题组成立前的准备过程中,赵德馨与苏少之、赵凌云、王秀兰收集并编辑了10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文献目录索引(1949~1982)》。该索引收录了1949~1982年间论述新中国经济的著述与资料目录,为课题组成立后迅速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课题组成立时的开题报告中,赵德馨提出到1990年,就1949~1985年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四卷写出可供主编审定的书稿。当初之所以将下限定在1985年,主要是当时估计公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完全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政府所替代,从而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可能到1985年才能完成。后来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比当时的估计快了一年,于是将下限调整为1984年。全书写作的进度,也比开题时的估计快了两年多。1988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著作,同时也可用作教材。同年,他主编的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后续的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和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84)》。这是国内外出版的第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同时形成了既突出宏观经济演变主线、又详细考察部门经济演变状况的纵横结合的新中国经济史著述范式。

在研撰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同时,赵德馨及其团队的教学和其他相关研究工作也跟随历史前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一是从1985年开始在本科生中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

二是从1985年开始招收经济史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的专门人才,开国内高校之先河。该方向逐渐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专业培养研究生的重点方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亦成为国内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人员的重要学术机构^②。所培养的研究生中,有些已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三是举办国内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专业学术研讨会。1985年10月,赵德馨组织举办了“湖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专业学术研讨会。1987年3月,赵德馨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书稿。与会者认为它可以作为本科生学习这门课的

教科书,同时也认识到开设这门课的意义。会后,多所大学开始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

四是为中南财经大学编纂的《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条释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从此作为学科被列入学科辞典。

五是推动成立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1986年12月,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会成立,赵德馨被推选为副会长。

六是协助《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设“中国现代经济史”栏目。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中国现代经济史”是该刊的常设栏目。在最初的几年中,赵德馨研究团队是该栏目的主要作者群之一。

七是主持设计和撰写新中国经济史辞条。1990年,何盛明主编的《财经大辞典》面世。其中的“经济史”篇由赵德馨主编,所含新中国经济史的条目,时间下限为1984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条首次被纳入财经辞典。

八是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理论。20世纪50年代,赵德馨即开始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理念、方法、功能、分期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系列成果,系统阐述了上述基本问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理论^③。

1992年春,邓小平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提出应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决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做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决策。赵德馨认为,这标志着从1979年开始的,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格局已于1991年结束。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以市场经济为框架的新阶段和经济增长提速的新时期。为了验证这种认识,他花了4年时间(1992~1995年)细心观察经济的变化,并将这4年的情况与1992年之前的进行对比,认定1991年与1992年之间,确实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线,于是下定决心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五卷的研究工作。该卷上起1985年,下迄1991年,于1999年出版。

在主持编写第五卷的过程中,赵德馨对自己的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和40年的研究实践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两点认识。第一,自1956年以来的每一次“跟随”,都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结束之后,才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研究成果问世的时间与研究对象时间下限的时间间隔越长,判断往往越准确,认识越深刻。反之则相反。这是因为,一种历史事物,在其演变过程结束后,经历的沉淀时间越长,其后续的影响显现得越充分。所以,跟随历史前进应与历史沉淀时间相结合。基于实践经验得到的这两点认识,以及同行学者(如南开大学的郭士浩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董志凯研究员)的提示,赵德馨得出了跟随论与沉淀论相统一的新理念。作为第五卷前言的《跟随历史前进》和后记《跟随论与沉淀论的统一》,阐述了这一新理念的内涵。这一新理念也成为编纂该卷及此后诸卷的重要指导思想。

1998年退休后,赵德馨没有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长期返聘他,继续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的工作。2000年底,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赵德馨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开始启动第六卷的研究工作。2010年,赵德馨的学生苏少之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获准立项。该项目在前五卷的基础上增设了第六卷(1992~2001)和第七卷(2002~2008)。在立项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已组织科研力量对前五卷进行修订,赵德馨教授提出了具体的修订提纲。在第六卷和第七卷开题时,赵德馨主要就断限、主题和基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第七卷的下限问题,赵德馨认为应以2008年为宜。经过几年的讨论与实践,课题组接受了这一观点。经过多年研撰和修订,由赵德馨和苏少之共同主编的七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0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2008)》将于2020年底出版。

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典》,也是跟随历史前进的。1990年,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辞

典》出版,时间下限止于1949年。同年出版的《财经大辞典》中的“经济史”篇,时间下限为1984年。为编纂一部更贴近现实、更系统而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典,经多年准备,2017年赵德馨正式启动编纂工作。应出版社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典》和《中国经济史辞典》分别作为《中国经济史大辞典》的下卷和上卷同时出(再)版。《中国经济史大辞典》下卷下迄2019年,拟于2020年年底出版,将是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典^④。

基于同样的理念,并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赵德馨主编的10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写到1991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纳入中国经济通史之中。这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通史^⑤。该书问世后,《中国新闻出版报》用整版加以评介,《中华读书报》刊文称赞其“规模最大、学术分量最重”。2003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可以说,正是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引导了赵德馨及其团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他们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系列论著,体现了跟随历史前进的理念。

一个学科形成的标志,体现在多个方面。综合各种观点,无外乎一部多卷本专著的出版、一门同名课程在大学的开设、同名专业研究生的招收,同名的或同内涵的学术团体的成立并有经常性的学术活动、同名的或同领域的专业刊物的出版并能长期发行、同名的或同内涵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并能成为常设机构以及学科理论的形成等方面。仅从赵德馨主持或参与推动的上述工作来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已基本形成。当然,科学研究是一项集体的事业。一门新学科的形成是学者群体积极回应时代呼唤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也遵循了这一逻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而改革开放的新环境,则为此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正是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集中涌现了一批可用于本科教学的新中国经济史教材^⑥,出版了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综合系列著作^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内设立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组,一些大学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等等。其中有些工作,走在了赵德馨研究团队的前面。赵德馨在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研究时,也特别关注和介绍了这些工作,并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

跟国内同行相比,赵德馨领衔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课题组,在学科建设上所做的工作,具有如下四方面突出特点:一是起步较早。如上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赵德馨等人就开始研究新中国经济史并付诸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形成的关键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此学科建设上所做的系列工作,也都是较早的。二是学科建设意识比较强烈。学科建设意识是学科建设的理论自觉。其虽建立在对具体知识领域的研究实践基础之上,但主要是对知识领域边界的界定和研究行为的规范的理论思考,意在推动知识领域(即学科)研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的学科建设理论,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赵德馨是一位具有强烈学科建设意识的经济史学者。他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属性问题,1984年即撰文论述了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必要性、任务与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了学科理论体系,在90年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科建设理论^⑧。这是赵德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三是学科建设的成果比较系统。相应成果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文献资料目录索引》(待刊)、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系列专题论文、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教材,构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带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风格的成果体系与学科框架。同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建设上,非常注重学术研究与学术后备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这使学科建设更具可持续性,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四是拥有一个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长期延续、相对稳定、较好地实现了新老交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组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于1983年,延续至今。课题组成员来源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分布在国内多个省市的高校、党校、社科院等研究机构。以上四点充分彰显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上所形成的特色与风格,也凸显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建设上做出的重要贡献。正因如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国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重要基地之一,赵德馨则被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上取得的系列成果,获得了众多荣誉。其中,仅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就荣获国家级优秀奖1项和省部级奖6项,足见学界对其价值的认可。该书也产生了较大国际影响,此处仅举两例。其一是赵德馨的亲身经历。1995年中南财经大学委派赵德馨率团赴日本开展学术交流。前来接待的东京大学、神户大学、名古屋大学和福岛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均有一套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即便担任访问东京导游的福冈大学讲师,也有一套。在交流时,多位教授认为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将他们无法看到的资料集中起来,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和分析,对他们了解中国经济情况很有帮助,也很及时,所以个人购置的较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亦较多。后通过日本大学图书馆网站搜索,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4卷)的有44馆,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4卷)的有36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县市地区图书馆也有收藏。其二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有关。科斯在其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列出了他们所收集的关于新中国政治经济的中、英文著作,认为“最为综合全面的资料可参见赵德馨(1988~1999)主编的五部系列著作。”^{[1](P11)}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赵德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他一再强调,既有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拥有一个团结稳定的学术团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是学界同仁集体努力的结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赖于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后学的持续耕耘。

三、以新理念提升学科建设定位: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

学科建设以实现学科功能为鹄的。赵德馨至为重视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构建功能。1995年,他在《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一文中,从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出发,阐述了一个重要理念: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担负着抽象出经济史理论也就是经济理论的任务^[2]。2002年,在《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一文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念,认为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3]。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研究理路,体现了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特性问题的认知。所谓历史特性问题是指“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类型……因而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不同的理论”^{[4](P27)}。经济理论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理论。那些所谓的“一般性”经济理论,要么名不副实,要么仅仅是若干准则或方法,从而缺少对据以构建理论的时空之外的具体事实的解释力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力。因而,任何经济理论都应该被历史地看待,合用的经济理论则应历史的建构。这一认知使他并不满足于使用既有理论解释历史甚或一般意义上使用历史来检验既有理论的做法。在他看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接受检验的经济学理论,基本都是“舶来品”。这些经济学理论尽管被其构建者有意无意地宣称具有一般性,但事实上都是基于“他者”经验构建的,在问题意识、前提假设与话语体系上均具有明显“他者”特征。即便通过中国经验来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甚至进而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也往往难以突破“他者”的话语体系。中国经济演进历程具有显著中国特色,这客观上需要构建更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历史与现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基于这一理念,他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在《中国需要一门中国经济发展学》和《中国经济发展学论纲》两篇论文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理论特征。赵德馨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学,是指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包括各种经济变量和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非经济变量在内的“全”要素分析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并非以中国为研究个案的发展经济学。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途径和研究内容,他也做了系统阐述。在研究目的上,他意图在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同时,为解决世界经济

发展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应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综合运用归纳法、演绎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在研究途径上,他强调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在深入研究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基础上,通过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在研究内容上,他认为应该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基本特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中国经济发展机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等九个方面^{[5][6]}。

从赵德馨的构想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学兼具英国历史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经济学的特征,即既坚持对理论的历史主义批判态度,也试图从归纳性的历史研究中推导出一般规律,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7](P1-2)}。但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方法论,又明显有别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经济学。后者极为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但仅基于归纳法难以构建足以深刻反映规律性的理论。一方面,若缺少对内在因果关系或作用机制的深入思考与探究,仅使用归纳法得出的“规律”往往会流于表象,从而难以为现实实践提供足够有用的理论。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构建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排除演绎法。即便是一项具有显著历史主义特征的研究,在其理论观点的抽象和应用上,也必然会用到演绎法。赵德馨并未陷入仅仅倚重归纳法的纯粹经验主义,而是明确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对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同等重要性,也明确将“中国经济发展机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可见,从方法论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学明显超越了执着于归纳法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经济学。

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思路对“历史性”或“中国特色”的强调,难免会使人们担心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性诉求可能会因此被削弱。毕竟,如果一种理论的时空特征过于显著,很可能会弱化甚至丧失对“他者”的借鉴意义。对此,赵德馨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国别研究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仅没有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使我们从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和各种特殊的理论模式,这正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试图仅通过从相对狭窄的区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式出发去建立一般性理论导致的^[5]。由此可见,他虽强调不同系统类型存在的差异性,但并未否定不同系统类型之间可能存在的共通性或一般性,也展现出探求这种共通性或一般性的理论诉求,只是更强调对共通性或一般性的探求,应建立在充分融合各种基于具体系统类型构建的特殊理论模式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应用范围从单一系统类型向跨系统类型的扩展,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学与以中国为研究个案的发展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之处。

赵德馨对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倡导,并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将其积极付诸学术实践,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互补经济理论、“之”字路理论等。其中,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提出经济现代化应建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协同并进的基础之上;过渡性经济形态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特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互补经济理论认为由经济形态的多元互补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的互补构成的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之”字路理论认为确立正确的发展指导思想、构建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设定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不难发现,这些理论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重要体现,是或从中国经济史中提炼新的分析性概念,或为习见的概念赋予特定的中国历史内涵。这凸显出赵德馨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实践路径的特点。当然,从理论结构来看,上述理论重在历史性概括,对内在因果机制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离赵德馨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设想还有相当距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机制分析和系统化这些理论观点,一直是赵德馨的目标。

赵德馨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设想,除了得益于其作为经济史学家所具有的专业思维优势外,主要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历史性特征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也具有显著历史性特征。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8](P35)}。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特征的认知状况,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轨迹。凡将具有历史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观点视为“一般性”理论而简单照搬或套用于中国实践时,便会导致所谓的“教条主义”,进而导致实践中的曲折或挫折。反之,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即在坚持具有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探索更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就会比较顺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均是成功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客观上呈现出强烈历史性特征,充分体现了理论自觉意识。习近平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强调,其实就是对这种历史性特征和理论自觉意识的强调。赵德馨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历史性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认知,并明确将其作为论证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德馨对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提倡,其实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在其研究中的运用。这表明,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内在方法与旨趣上的一致性。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赵德馨之所以一再倡导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并将其付诸学术实践,意在提醒中国经济史学人,应从构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事实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提高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使命感。这也是对经济史学科功能的更准确也更高的定位。赵德馨所提出的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学术诉求与实践路径,或许能对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有所启发。

四、结语

学科建设是集体的事业,赵德馨一再强调这一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一直在向同行学习借鉴学科建设经验,也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近年来,国内经济史学科建设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经济类院系中的经济史学科而言,传统重镇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西大学等成就傲人,后起之秀如中央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南大学等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院,还先后成立了经济史学系或经济史系。他们在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拓展、研究领域的开拓、学科组织形式的创新等方面的学科建设经验,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当下,中央提出的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指向,也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为在推进国内经济史学科建设上贡献绵薄之力,基于本文的回顾性考察,芹献五点学科建设经验:一是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为指导;二是形成和贯彻与学科特点相契合的学科建设理念;三是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又能较好实现新老交替的学术研究团队;四是注重学科成果体系的构建;五是重视学科自觉意识的养成。希望这些经验能对当前的学科建设有所启示,并祈请同仁指正。

注释:

①1958年改名湖北大学,后复名中南财经学院,再改名中南财经大学,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之一。

②1999年,又在国内较早开始招收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向仍为重点培养方向。

③参见《大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是时代的需要》(《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分期》(《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辞条释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问题》(《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2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导言。

④因经济史辞典仅为记事,故下限尽可能贴近现实。

⑤同一时期出版的另一套9卷本《中国经济通史》,只写到清代前期。

⑥除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外,其他较有代表性的有:柳随年和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一九四九~一九八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德彬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柳随年和吴群敢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史1949~1952》(求实出版社,1988年);李宗植和张寿彭主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蒋家俊、尤宪迅、周振汉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柏福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年)。

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柳随年和吴群政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 1949~195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民经济 1953~1957》《“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 1958~1965》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 1966~1976》。除第四部于1986年出版外,其他三部均出版于1984年。这四部著作与赵德馨主编的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存在诸多差异。主要有五:一是前者未明确破题,即未明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名称;二是前者涵盖的时间范围比后者少了8年;三是前者篇幅相对较小,总字数约52.5万字,而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总字数为123万字;四是前者缺少对部门经济的系统考察;五是前者的作者主要就职于政府部门,而后的作者均为大学教师。

⑧在研究意义上,他认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书写当代信史、了解国情、对外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需要。在研究对象上,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属于国民经济史的范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境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与统一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其特点是研究一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因而其虽由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各形式、各地区的经济的历史所构成,但不是它们的简单加总,而是有机统一体。在研究理念上,他主张应遵循“跟随论与沉淀论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择良法”与“论从史出”,应处理好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经济发展的对照关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客观之间的关系等六大关系。在研究(学科)功能上,他强调“三求”——求真、求解、求用。在分期标准上,他主张应以国民经济演变的内在阶段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变的阶段性而非政治运动或主观意愿(如“五年计划”)作为分期标准,尽管以不同标准划分的阶段可能会出现重合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 [2] 赵德馨,李洪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J].经济学情报,1995,(2):23—29.
- [3] 赵德馨.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68—73.
- [4] 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5] 赵德馨,周军.中国需要一门中国经济发展学[J].经济评论,1997,(1):15—21.
- [6] 赵德馨,易绵阳.中国经济发展学论纲[J].求索,2017,(10):46—54.
- [7] 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8]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陈敦贤)

(上接第128页)

- [28] Barone, G., Cingano, F. Service Regula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J].The Economic Journal, 2011, 121(555): 931—957.
- [29] 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业及其集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J].中国经济问题,2008,(1):3—12.
- [30] 冯泰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3):56—65.
- [31] 申广军.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6,(12):13—24.
- [32] Kane, E.J. Dangers of Capital Forbearance: The Case of the FSLIC and "Zombie"[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1987, 5(1): 77—83.
- [33] Fukuda, S., Nakamura, J. Why did "Zombie" Firms Recover in Japan? [J].World Economy, 2011, 34(7): 1124—1137.
- [34] 蒋灵多,陆毅,陈勇兵.市场机制是否有利于僵尸企业处置:以外资管制放松为例[J].世界经济,2018,(9):121—145.
- [35] 孙浦阳,蒋为,陈惟.外资自由化、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J].管理世界,2015,(11):53—69.
- [36] Baron, R.M., Kenny, D.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 [37]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责任编辑:易会文)